



北京民俗论丛

第二辑

北京民俗博物馆 编

北京民俗论丛

第二辑

北京民俗博物馆 编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民俗论丛. 第2辑 / 北京民俗博物馆编. —北京 : 学苑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077-4178-0

I. ①北… II. ①北… III. ①风俗习惯—北京市—文集 IV. ①K892.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9251 号

责任编辑 : 洪文雄

装帧设计 : 徐道会

出版发行 :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 100079

网 址 :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 北京彩蝶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 787×1092 1/16

印 张 : 12.75

字 数 : 220千字

版 次 : 2014年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 201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 48.00元

《北京民俗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曹彦生
委 员 李彩萍 关 昕 杨 英
田莉莉 朱 羿 崔瑞萍
王建涛

主 编 曹彦生
执行主编 关 昕
编 辑 杨 英 田莉莉

卷首语

当今中国博物馆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具体表现在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藏品种类日渐丰富、展示体系渐趋完整和社会影响与日俱增等诸多方面。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博物馆从业者认识到，传统博物馆正走向思维范式和行为模式的转换，博物馆的收藏保管功能、研究功能和社会教育功能这“三大传统功能”正在逐步走向现代化转型。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活和命运、重视人的需求，正成为博物馆文化新的思考点。

在这种转向中，更为注重了博物馆的公共性表达。博物馆作为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需要迈向更开放、更具参与性的进程。有研究者指出，所谓博物馆的公共性，其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公正性、公平性、公益性、公开性。它不仅是一个普罗大众可参与并享受博物馆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的文化空间，而且也应该是一个传递信息、思想和价值观的公共场域。

博物馆的社会价值，不是给人们鉴宝，不是为民众的猎奇赏鉴提供场地和平台，而是通过走向多元化的体验，向民众提供对于每一种文化的尊重和理解，和历史观、生活观、社会观、价值观的传递。

对于不同类型的博物馆，不同的物质载体，所给人们带来的体验都是有差异的。真正从客体角度出发，从塑造观众独特的感动经验出发考虑工作，或许是克服以“千馆一面”为表征的个性化缺失现象的解决之道，也是博物馆在未来发展中需要明确的理念。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将在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继续明

确走向公共服务这一博物馆的发展路径，为社会公众提供多元的文化感受，塑造独特的体验模式，推进民俗传统文化的反哺于人们生活。同时，以《北京民俗论丛》为平台，把对实践的探索与理论相结合，和博物馆同行一起，去探讨，去思考，来体现博物馆作为新时代发展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所应起到的作用。

目 录

博物馆理论与实践

博物馆民族志书写

——以林惠祥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53年—1966年）为例 尹凯 /1

首都博物馆里的京城京事——谈“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展的立意与展陈亮点 穆红丽 /10

民俗类专题综合博物馆的展览模式——以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为例 章晓烁 /21

洛阳民俗博物馆的发展之路 王支援 /39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博物馆参与的回顾与前瞻 牛长立 周理远 /46

北京地区历史建筑博物馆化保护的利弊 吕伟涛 /59

博物馆公共性与开发经营活动关系探究 何志文 /67

民俗文物研究

浅谈钱慧安人物画风格与天津杨柳青年画渊源 陈晨 /73

晚清宫廷戏曲玩具述论 万秀锋 /80

方寸天地 毫芒微雕——浅析象牙浅刻与微雕 霍楠 /89

“醋外之味”——《三酸图》中的和谐文化 裴伟 /102

余音尚在的百年京剧文物——谈陈德霖和杨小楼的唱片 张楠平 /109

北京史地民俗

面对“民俗”——民国北京各界的庙会感知 徐鹤涛 /117

村落语境中的庙会展演与文化表达

——对北京朝阳区上辛堡村庙会的调查报告 田莉莉 /125

堂里堂外——北京天主教南堂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张影舒 /140

庆丰闸历史文化探析 王路平 /152

文化遗产语境下的小红门地秧歌调查与思考 杜洋 /159

春日融融说踏青 文爱群 /166

1927年的北京东岳庙（节选） Janet R. TenBroeck（著） 李锦萍（译） /173

消息

第六届东岳论坛在北京举办 /190

附录

2013年北京民俗博物馆大事记 /193

征稿启事 /195

博物馆的民族志书写

——以林惠祥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53年—1966年）¹为例

尹 凯

博物馆与人类学学科之间有很深厚的渊源，作为人类学第一个机构性栖息之所，博物馆成为人类学器物收藏、展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知识体系空间。作为一种博物馆形态，有其自身的实践原则与分类逻辑。博物馆空间内充斥的人类学器物与标本以一种“非文本”的形态呈现着人类学理论的发展与变迁。博物馆民族志指的是以某一博物馆为田野点，对其内部的空间、秩序、艺术、科学、常识、意识形态等要素进行民族志分析与阐释。无论从人类学学科还是从博物馆机构来看，林惠祥主持成立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在中国早期人类学与博物馆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其博物馆展示空间的民族志书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上世纪中国学人在西方理论与本土经验之间所做的努力。

一、人类学与博物馆的亲缘关系

作为一门学科的“人类学”（anthropology）与作为一个机构的“博物馆”（museum）原本是互不相干的两个范畴；今天人们所广泛使用的“museum”一

〔作者简介〕尹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1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在1953年至1966年间的博物馆内容不同于与1978年改革至今，其结构与主题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本文进行的分析是基于林惠祥先生《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1958）展开的，后期的变化与对照，参见田吟：人类博物馆主题结构的改变述议〔C〕，汪毅夫、郭志超：纪念林惠祥文集〔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371。

词，源自希腊语“mouseion”，是指缪斯女神（Muses）神殿¹；人类学术语的首次出现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其希腊词源是 Anthropos（人）+Logic（研究），即人的研究之意。²人类博物馆的诞生并没有延续古典时期博物馆的谱系学传统，成为一种“一种认识论的结构，其中包含了各种想法，图像，同时也是文艺复兴后期的文化中心。”³而是伴随着15—16世纪航海时代的“全球探险”过程而出现，航海技术的突破，不仅带来了跨国贸易，也使跨国度搜集奇珍异宝成为可能。⁴欧洲的探险家云游世界各地，搜罗各种奇珍异宝，大量异文化器物标本的涌入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欧洲传统的“珍宝馆体系”，形成了有其自身分类原则与秩序的“人类博物馆”（民族志博物馆）。

从此以后，博物馆与人类学走到了一起，博物馆为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提供工作环境与研究材料，还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场所，在另一方面，人类学理论也成为博物馆展品陈列的文化逻辑来源。两者之间的交叉与整合开启了一个“博物馆人类学”的时代（1840—1920），它也被一些人类学者称为“人类学的第一个博物馆时期”（the First Museum Age of Anthropology）。⁵因此，将人类博物馆作为一个“田野点”进行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不仅要求我们把有限空间的展品作为“异文化”（时间上与空间上）的表征进行分析与研究，而且还需要揭示器物标本背后的分类原则与人类学理论，将人类博物馆与人类学，甚至与人类近现代的知识谱系发展联系起来。

可以说，人类博物馆在陈列、组织、展览不同文明体系的器物标本方式上与西方传统的珍宝室、博物馆具有一些区别。首先，从目的上来说，后者的主要目的是审美性的，而前者的目的是学科性的；其次，从文化逻辑上来说，后者主要是追溯其对于古罗马、古希腊文明的继承⁶，而前者则没有这种诉求，其更多是通过“他者”的远望来寻求“自我”的准确定位；第三，从社会文化结构来说，后者是一种根植于西方社会的机构形态，它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而前者与学科发展的关系更为紧密，受社会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少。林惠祥曾经指出，人类博物

1 杨玲，潘守永，当代西方博物馆发展态势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4。

2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

3 Paula Findlen, "The Museum: Its Classical Etymology and Renaissance Genealogy", Bettina Messias Carbonell, "Museum Studies An Anthology of Context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p.23.

4 杨玲，潘守永，当代西方博物馆发展态势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5。

5 William C. Sturtvant, "Does Anthropology need Museum?" in Natural History Collections Symposium, 1969, Nov.17.

6 Carol Duncan, Alan Wallach, "The Universal Survey Museum", Bettina Messias Carbonell, "Museum Studies An Anthology of Context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p51-71.

馆作为大学附设的博物馆与独立的专为社会教育而设的博物馆有同点也有异点，人类博物馆不仅要帮助社会教育，而且还要兼作科学研究，培养专门人才。¹

这些不同意味着人类博物馆内部具有相对独立的分类体系与秩序原则，通过人类博物馆的筹备，人类学理论或多或少的体现在展品的陈列与展览秩序中。人类博物馆内器物标本的陈列、展示、分类次序，使我们能够对人类学理论以及人类近现代知识谱系的深层次分析与阐释。

二、器物标本的搜集：从异域到博物馆

在此，笔者将以1953年成立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53年—1966年）为例，对其内部的器物标本进行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志书写，以揭示中国早期博物馆背后的人类学理论与知识谱系。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前身是林惠祥先生在1934年设立的私人的厦门大学博物馆筹备处。1951年，林惠祥先生将文物及图书一并捐献厦门大学，建议由厦门大学设立人类博物馆，王亚南校长接受后呈函华东教育部。年底奉中央教育部批准，即于1952年春设立筹备处。²1953年3月16日正式成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博物馆内的器物标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是台湾地区的考古发现，1929年赴台湾调查收集的标本143件，共分为十大类：武器、衣服、货币及饰物、家具、艺术品、娱乐品、宗教以及仪式品、记事绳、舟、石器时代遗物³，以及1935年第二次赴台湾深入高山族地区调查，获得高山族刀、枪、弓、箭、衣、饰、雕刻物、船模型、石器以及音乐柞等器物数十件；二是东南地区的发现，1937年6月，林惠祥先生参与了武平县考古发掘，发现的84件石器交给林先生的人类学博物馆筹备处保存陈列，供厦门大学教学应用。⁴林惠祥先生在1951年—1955年间一直在龙岩、惠安、闽侯、南安、长汀、泉州等地进行石器时代遗址、遗物的发掘、清理工作。三是南洋研究发掘，1937年—1947年林惠祥因为战争影响流亡南洋，1941年，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华玲进行考古发掘，3月29日再到华玲采得石器89件，陶片一件，动物化石骨7块，在其中，林先生还托人购买了7件雷石，这是南洋石器特征的典型代表。随后在都卜列第洞石器时代住所发现了石器70件，林先生将这其中的147件带回了国内，研究发现处于旧石器时代

1 林惠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M]，厦门：厦门大学印刷厂，1958：2。

2 林惠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M]，厦门：厦门大学印刷厂，1958：1。

3 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42-74。

4 林惠祥，福建武平县新石器时代遗址[J]，厦门大学学报，1956（4）。

中期。¹四、对华北地区文物的搜集与购买、华侨捐赠的文物模型等。

人类博物馆内器物标本的搜集、来源渠道是对作为“非文本”的物进行分类秩序分析的基础，在将异域情景中的器物转移到博物馆空间内的过程中，林惠祥先生丰富的田野工作经历以及对人类学器物标本的关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空间秩序：博物馆中的知识体系

林惠祥在对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进行定位的时候说：“本馆的性质是专门博物馆，即专门搜罗陈列有关人类及其文化发展的文物博物馆，在时间上是自有史以前以至于现代，在地域上是世界性的。”²陈列的目的是要说明人类本身的起源演变以及其生活文化的发展路径，以供我们现代人的借镜，为创造未来的幸福世界的参考。³由此可见，人类博物馆所收集的器物标本种类仅局限于人类一种，而且在地域上并没有限制，这与地方性博物馆有很大的不同。下面让我们通过林惠祥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来审视当时人类博物馆内的陈列秩序与博物馆外的人类学理论与知识谱系是如何塑造器物标本的展示秩序、作为客体的参观者以及知识的延续与发展的。

（一）历时性表述——整体视角下的“进化”学说

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认为可接受的民族志工作的首要条件是，它必须把该社区中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所有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⁴在对博物馆进行民族志书写过程中，这种整体观的方法论立场同样是极为重要，不至于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展品陈列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史前部门，有史时代的部门，现代人种部门，其他部门⁵；主要的器物标本包括三个类别：实物、模型以及图画、照片。从整体观的角度来说，进化论的理论主导了整个人类博物馆内的展品陈列，史前时代最早，有史时代继之，现代接其后，这样就包括了人类发展的整个过程。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进化”学说一度是主导人类学界的核心理论。⁶19世纪末，亨利·里弗斯 (Henry Pitt Rivers)

1 林惠祥，马来西亚吉打州石器时代考古追记[J]，厦门大学学报，1959（1）。

2 林惠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M]，厦门：厦门大学印刷厂，1958：2。

3 林惠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M]，厦门：厦门大学印刷厂，1958：2。

4 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梁永佳、李绍明译，高丙中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

5 林惠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M]，厦门：厦门大学印刷厂，1958：3。

6 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96.

将社会科学领域风行的达尔文主义引入民族博物馆展览领域,从而使得博物馆及其相关机构逐步被塑造为“进化论”最为精确的表述机器。¹可以说,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延续了这条传统的表述路径,在宏观上,还是以进化论的学说为主,按照科学分类体系来建立展陈框架,这种科学理论也通过器物标本的展示形塑了参观者的主体观念。在这个过程当中,林惠祥先生为了陈述的完整性与进化序列的连贯性还运用了模型,强调整体收藏的重要性,这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图解方案,即一种相对严格的历史序列的陈列²是类似的,都追求一种“进化”学说下的历史序列性与连贯性。

“进化”学说是西方的一种知识与权力话语,强化欧洲世界的文明意识和国家秩序,体现现代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性。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内,“进化”学说话语下的器物标本秩序企图表述的内涵却与西方博物馆理念有很大的不同,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内,“进化论”话语下的展陈是为了展示人类发展历程,证实我国作为世界文明中心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明了各种事物的来源,加强人们爱好劳动的思想³,其社会教育与普及知识的理念更为明显,没有明显的价值判断的痕迹。

(二) 共时性的可能性——历史特殊主义对“进化”学说的补充

“进化”学说的史学路径与博物馆内通过器物来讲述历史的路径是不谋而合的,但是在博物馆内,“进化”只能起到整体掌控的作用,而不能在具体器物的陈列中出现,否则就会出现“原属同一族群的器物要按照各自的功能被拆散,或者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器物被强行组合在一起”⁴的现象。

作为对进化论的反思,一种重述过去社会文化形态的理论出现了。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Boas)认为民族学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社会生活现象(即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⁵由此可见博厄斯对于整体文化的强调,即主张人类学研究的重点从“对象的外部形态与功能”上转移到“对象的内在意义”上来。⁶在人类博物馆内部,这体现在具体器物的展示中对器物所在的文化有机体的呈现,避免器物由于脱离了物品的“语境”(context)而失去本身具有的意义。可以说以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特殊主义博物馆内部的陈展中是起到

1 安琪.表述异文化:人类学博物馆的民族志类型研究[J].思想战线,2011(2).

2 Carol Duncan, Alan Wallach, "The Universal Survey Museum". Bettina Messias Carbonell. "Museum Studies An Anthology of Context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p67.

3 林惠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M].厦门:厦门大学印刷厂,1958:4,14.

4 安琪.表述异文化:人类学博物馆的民族志类型研究[J].思想战线,2011(2).

5 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33.

6 安琪.表述异文化:人类学博物馆的民族志类型研究[J].思想战线,2011(2).

了修正“进化”学说的作用，使得人类发展进程与文化轨迹更完整的呈现在参观者的面前。

1958年，林惠祥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陈列品说明书》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得益于林惠祥先生的学术传统，林惠祥先生导师是美国人类学拜耶教授，美国人类学的全域性专业理念与博厄斯的传统极大熏陶了他。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陈展中，林惠祥先生用“模型、图画”作为博物馆陈列品来实现文化有机体的呈现。在史前时期的陈列品中，当时人的生活与环境的模型，图画表现当时人的体貌、生活情形和环境，这与器物相互对照，使参观者对当时人类的身体和生活有一个概念。¹在有史时代的陈列品中，虽然按照种类的陈列法，但在人类博物馆内还塑造了一批历史时代的人物模型，以便配合文物说明各时代的衣服装饰、风俗习惯。此外有大幅油画并在特制的屏上贴上各种图片，以配合实物及模型。²林惠祥先生试图在有限的器物陈列中通过这些手法的运用给我们呈现中国过去文化的全貌，不至于落入“进化”学说的窠臼里，避免重复梅森（Mason）领导下的美国国家博物馆民族部的弊病。

在一定意义上，林惠祥先生主持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正向博厄斯所倡导的方向努力，博厄斯心目中理想的民族展览模式是一个以“器物标本”为圆心，向外扩散和推移的立体空间结构，展品周围安放与它的生产使用相关的人和环境，以及影响这一生产和使用过程的其他文化现象。³这种对人类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尝试已经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内得到了体现，可以说，人类学知识在博物馆内得到了实践与展演，这也在另一方面促进了这种知识的扩散与传播。

（三）世界性器物的陈展——传播论与历史相对主义的知识构架

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陈列品收集过程中，我们对林惠祥先生的器物来源进行了区分，大致可包括台湾地区，东南地区，南洋地区。在博物馆的陈展过程中，史前时期部分陈列了南洋马来亚旧石器型遗物，在民族标本及人种模型部分陈列了南洋民族标本，林惠祥先生试图在博物馆内论述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通过比较在考古发掘中的发现，隆脊石镞、有肩石斧、石箭镞、陶器纹饰等，证明了马来人是从大陆南下形成的。⁴同样，在民族标本及人种模型部门陈列了国内兄弟民族的标本，其中台湾高山族的器物占大部分，林惠祥

1 林惠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M]，厦门：厦门大学印刷厂，1958：4。

2 林惠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M]，厦门：厦门大学印刷厂，1958：14。

3 安琪，表述异文化：人类学博物馆的民族志类型研究[J]，思想战线，2011（2）。

4 林惠祥，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J]，星洲日报半月刊，1938（8）。

先生于1929年与1935年收集的标本与资料为后来的台湾与大陆关系论述奠定了基础。

这种人类博物馆内的陈列秩序既不是“进化”学说的指导，也不是文化有机体形貌的主张，而是遵循着文化传播学派的理论主张。文化传播论者认为，器物标本的陈列与分类应该依据不同地区的同类器物所携带的相似的文化特征为原则，即弗罗贝纽斯所谓的“文化圈”概念，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中国东南地区、南洋地区作为三个“文化圈”，其内部物质文化特质的相似性与亲缘关系是其在人类博物馆内得以陈展的深层次原因。

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的第三部分中罗列了世界民族标本及人种模型，包括国内兄弟民族标本、南洋民族标本、印度民族标本、日本民族标本、蒙古利亚种模型、高加索种模型、尼格罗种模型、系统不明的小种族等¹。其目的是为了明了各族的体貌衣饰、风俗习惯，扩大眼界，增加对外族的了解和同情心。知道世界各民族在外表上虽是千差万别的，但都同样是人，是同出一源的，是平等的，因而去掉狭隘的民族观念，养成正确的民族观念和国际观念。²博厄斯主张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的评判标准，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可以说林惠祥先生的人类博物馆空间秩序与知识体系正是对博厄斯文化相对主义的真正实践，将反对种族主义的理论主张带到了博物馆陈列中。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作为中国人类博物馆的早期形态与西方所谓的“遍及全球收藏的博物馆”（The Universal Survey Museum）具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具有一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倾向，而这正是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所反对的理论主张。

四、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博物馆民族志

在“人类学”与“博物馆”整合的人类博物馆内，器物毫无疑问地服从于科学阐释系统，即人类博物馆内的器物标本与人类学知识是一种共存的关系。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更多的关注博物馆内静态的“物”的分析，即“物”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博物馆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以及博物馆内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类博物馆的民族志书写给了我们另一条研究博物馆的道路，即将博物馆作为一个人类学视域下的“田野点”，考察其有限空间内的“物”的秩序与人类学知识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国早期的人类博物馆形态是在进化论、传播

1 林惠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M]，厦门：厦门大学印刷厂，1958：45-55。

2 林惠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M]，厦门：厦门大学印刷厂，1958：45。

论、历史特殊主义的知识体系下进行实践的，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人类学表述危机”的出现，人类博物馆的关注点从静态的器物研究转向以人、物和社会关系的彼此互动及知识生产的动态过程上，更为强调其表述的多元性，这也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类学理论与知识的多样性密切相关。

博物馆民族志书写是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关注知识是如何在博物馆内得到生产、制造、传播，林惠祥先生曾说：“博物馆非藏古董之特殊机构，而实系执行社会教育之最良场所。盖书籍报纸之阅读均须以识字为先，博物馆则只需有眼者皆可参观而获得智识，故于教育不甚发达之民族最为有用。”¹ 也就说有文化的人通过学习理论来了解社会知识，而没有文化的人则通过博物馆获得智识。在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关注人类博物馆是如何将搜集、收藏的特定社会中的某些器物建立成为一套完整的物象表述系统的，即博物馆空间秩序背后的人类学知识到底是如何塑造博物馆形态与分类的。² 可以说，博物馆民族志的书写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考的视角。

在《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一文中，格尔茨（Geertz）认为，研究地点不等于研究对象。人类学家不研究乡村（部落、集镇、邻里…）；他们在乡村里研究。³ 在博物馆民族志的书写中，格尔茨的论述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博物馆人类学并不是研究博物馆，而是在博物馆这个意义复杂的场域内进行人类学民族志式的书写。在这里，博物馆技术并不是关注的焦点，博物馆内的器物标本构成、空间秩序、结构与博物馆背后的知识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是博物馆民族志书写的重点所在。

在标榜“后现代”的今天，博物馆并未缺席。博物馆所引发的文化批评与人类学学科领域内围绕民族志真实性、后殖民情景下对他者文化表述的反思，以及随之而来的职业伦理问题、对某些分析性范畴进行认识论意义上再认识的趋势遥相呼应。1972 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学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学的定义不仅强调对博物馆自身历史背景及分类的关注，强调博物馆的研究、保管、教化、组织职能，同时也强调博物馆与社会及物质环境间的联系。与此同时，对博物馆的研究还应当关注博物馆与知识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即福柯所谓的知识体系与权力关系结构。

博物馆民族志书写作为一个方法论，它走出了历史主义与物质文化研究的困境，将博物馆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观察，对器物标本的博物馆化、

1 林惠祥，南洋华侨应发展文化事业[J]，星洲日报半月刊，1938（2）。

2 安琪，民族文化与博物馆叙事——近代西南的“器物民族志”[J]，民族文学研究，2010（3）。

3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5。

收集器物标本的学者、空间的陈列秩序、知识体系、意识形态、政治条件与背景等要素进行统筹考量。这种博物馆民族志书写属于现代人类学领域内实验民族志的一种，立足于一个相对局部、相对微观的分析，将博物馆作为实践与思考方式，对社会文化与知识体系进行再书写。